

·文献学青年谈·

编者按:2019年3月6日下午,国家图书馆《文献》杂志编辑部邀请京内文献学界部分青年学者与编辑部座谈,就文献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。现将各位学者的意见与建议整理成文,刊布于此,以备参考。

读者的观感

王天然(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)

感谢张志清馆长与《文献》编辑部的邀请,以下所言谨供参考,错谬之处,也请各位指正。我们知道目前的文献学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,二者是分属中文、历史两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,这样两个二级学科相应的专业期刊却非常有限。在此背景下,作为拥有辉煌历史的本专业期刊,《文献》的办刊方向与学科建设实则息息相关、休戚与共。

当下文献学论文似乎存在几类问题,其中可能并非皆为文献学独有,但确实是阅读本类论文时往往可见者。在此提出,非敢责人,仅作镜鉴以自省。其一,雷同剿说,甚者重复误说。历代学者积累的文献学正确认识,本应是今天讨论的起点、本应是可被省略的论证步骤,而实际上并未成为常识固定下来。其二,貌似有朴素之形,本质却无定谳之实。文献类论文因常以“考证”的形象示人,故具有迷惑性的一面。若仔细勘验,其中不乏逻辑混乱、迂曲强说、隐匿证据之病。其三,重视发现过于发明。重视发现本无问题,但过分看重发现而少问发明,只见新材料,不见随之可能带来的新问题,这既是本末倒置,也是一种懒惰。

假若存在这些问题的文章常能得到学术刊物发表的鼓励,靡然向风,势必会使文献学丧失自己最擅长的研究方法与路径,遗忘自己最独特、最本色的部分,且最终一定会消磨从业者的专业自信。因此特别期望作为老牌核心期刊的《文献》能够振奋精神,作出示范。

具体建议如下:首先,有鉴于以上言及的种种问题,目前文献学专业刊物似应优先鼓励具有文献学学科特点的研究。所谓学科特点,应当是本学科得以独自树立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要素,即“文献”可以称为“学”的理由。先无

论创新,至少西汉刘向中秘校书的程式法度,仍然可以作为今天文献学研究方法、取径的重要参照。概言之,文献学主要以书籍为研究对象;以汇集众本、校讎异同、条理篇目、撮举旨意为基本方法——大致对应今天的版本学、校勘学、目录学的方法与理论;核心旨趣在于发现并解决书籍史(书籍本身的历史及与社会史相交通的部分)与学术史(学术源流演变的历史)中的问题。此为极粗陋的认识,愿为众矢之的,供大家批评,同时期待《文献》首先吸引此类本色当行的优秀成果。

其次,似乎还应鼓励文献学中物质形制层面的研究。清至民国,学者于书籍制度已多有留意。上自诂经精舍诸生(参汪继培、徐养原同题《周代书册制度考》,赵坦、金鹗同题《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》),下至王国维、马衡、余嘉锡等先生(参《简牍检署考》《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》《书册制度补考》),皆作专门著述,可见此类研究素有传统。窃谓物质与文本如车之两轮,无法割裂。目前形制方向的研究尚嫌粗略,物质载体的力量尚待揭示,其间实有广阔天地。除本具传统的主要关心书册外形的书籍制度一点之外,或许还可聚焦以下诸点:致力于纸张及其他文本载体的分析;对作为实体的书籍、书板中一切物质线索的考察,进而还原抄写、刻印的具体方法程式;着眼于目录的实际生成过程,即马楠老师所言书目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(详下)。希望《文献》对本专业研究中的此类薄弱环节予以关注和支持。

最后,无庸讳言,文献学学科存在边界不清、方法不明的现象,亟待同行协力讨论,这绝非不言自明、可坐等成说的。特别希望《文献》可以多多鼓励此类探索。而沟通中外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,似乎也应入选文方向之列。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沟通,应切乎实际,而非牵合,现试举一例作为引玉之砖。西方校勘学中有“难的异文更可取”之原则(参L.D. 雷诺兹、N.G. 威尔逊著,苏杰译《抄工与学者:希腊、拉丁文献传播史》;苏杰编译《西方校勘学论著选》),此原则与判断文本时间先后的方法相连,自不难理解。中国古文献中不乏可与之沟通的实例,只是此类蕴涵时间线索的异文,传统常以“训诂”目之。如《史记》采《尚书》,清人已言其中多以训诂代经文(参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,陈乔枏《今文尚书经说考》),即以史迁当时之今语释古语。但若更换视角,何尝不可据古今异辞,以断二者文本之先后?若推广施用于时代不明之文本,又何尝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?

以上所言定有十分不妥之处,只因对《文献》很有感情,也衷心希望刊物越办越好,所以话说得直接。切急之失,尚祈付出了诸多心血的编辑部老师能够原谅。